

中国地理学史

(清代)

赵荣 杨正泰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地理学史

(清代)

赵荣 杨正泰 著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地理学史:清代/赵荣,杨正泰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ISBN 7-100-02484-6

I. 中… II. ①赵… ②杨… III. 地理学史—中国—清代 IV. K90-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473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DÌLÍ XUÉSHǐ
(QÍNGDÀI)

中国地理学史
(清 代)

赵 荣 杨正泰 著
责任编辑 叶冰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2484-6/K·533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张 14 3/4

定价:25.30 元

前 言

清代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一方面,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地理学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极其显著的转变,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地理学愈来愈多地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地理学发展的主导方向。

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地理学的研究,无论对于研究地理学史,还是探索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规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清代地理学的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索和总结。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等著作,都列有清代地理学的专节。30年代出版的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也介绍了清代地理学成果。同时,王重民主持编写的《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则搜集了清人文集中的地理篇目。50年代以后,侯仁之、鞠继武、翟忠义、杨吾扬、刘盛佳、于希贤诸先生,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组,在他们撰写的地理学史专著中,也都或多或少地论及到清代地理学。此外,还有一些专门讨论清代地理学家或地理事件的学术论文,其中包括对顾炎武、顾祖禹、刘献廷、魏源、徐继畲、王锡祺、张相文等地理学家,以及河源认识、地图制作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但是,将清代地理学作为一个专题,运用科学观点,对它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和研究,问津者却不多。特别是从地理学思想、方法、观点上进行分析研究的更少。

关于清代地理学研究的这一现状,与它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王成组教授在完成《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先秦至明代)增订本时,表示要尽快开展清代部分的研究著述。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王成组先生未及看到上册增订本的正式出版^①,即于1987年以85岁高龄溘然长逝。他计划撰著的《中国地理学史》下册(清代),也未能形成文字,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

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考古学专业时,对历史地理很有兴趣,后来考取王成组教授的研究生的,专攻地理学史。毕业后,在讲授《中国地理学史》课程时,曾撰写了一部25万字的《中国地理学史稿》^②。1988年3月我将书稿目录和部分内容寄请商务印书馆陈江先生审阅,陈先生建议我以其中的清代部分为基础,再作深入研究,写成一部专门研究清代地理学的专著,使之成为

①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初版,1988年增订本。

② 该书压缩后,更名《中国古代地理学》,作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中的一种,1991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1993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和香港商务印书馆分别再版,北京商务印书馆近期将出该书修订版。

王成组教授《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的续篇,完成王成组教授撰写一套完整的《中国地理学史》的夙愿。

要在短期内完成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深感工作艰巨。1988年11月,我结识了复旦大学杨正泰先生,他当时正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地理学史概要》。我们志趣相投,专业爱好相同,遂邀请他共同参加研究和撰述,他欣然同意。于是,1988年12月我正式复信商务印书馆陈江先生,表示接受《中国地理学史(清代)》(此书名为陈先生所建议)一书的撰述,同时说明我已邀请杨正泰先生合作,并于1989年2月向商务印书馆正式提交了写作提纲及部分样稿,供商务印书馆审定(这次拟定的提纲,主要是本书上篇的部分内容)。

1989年9月,我考取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1月25日陈江先生函告:商务印书馆已正式决定将《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列入出版计划,要求我们积极从事写作,尽快交稿。此后,我结合为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地理系研究生讲授地理学思想史的体会,感到仅凭典型著作的分析,仍不足以系统、全面地揭示清代地理学发展的全貌,而应该将清代地理学思想史、清代地理学与世界地理学的比较研究一同纳入研究范围。这一想法得到杨正泰及陈江先生的赞许,特别是得到我的博士导师杨吾扬教授的充分肯定和鼓励。于是,我们便决定暂缓《中国地理学史(清代)》一书的写作,而以《清代地理学思想研究》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首先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1992年2月论文写成后,以它为基础,我们又向商务印书馆提交了一份《中国地理学史(清代)》的修订写作提纲(基本上为现在的纲目),并与杨正泰先生重新进行写作分工(第一、二、三、四章由杨正泰先生执笔,其余部分由我执笔)。随后我们各自开始写作。1993年2月初,在分头撰稿的基础上,我们又在西安对全书进行了讨论和修改,最后由我删定交出版社。1994年12月,根据商务印书馆的审阅意见,又由我对全书进行了最后的调整、删改。

关于清代地理学,我们试图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一是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代表性地理著作的分析,阐述清代地理名著的作者、内容、特点,以及它们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意义;二是通过对清代地理学思想的分析,系统说明清代地理视野的扩展、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自然地理规律的认识。同时还通过对中外地理学的发展及其特点进行比较,阐明清代地理学思想与外国地理学思想的交流方式,以及由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变过程。

清代的地理著述数量浩繁,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很广,有待讨论的问题很多,而我们涉猎的资料有限,列举要籍和代表人物的思想时,难免挂一漏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错漏或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正。如果这本书能引起更多同行对清代地理学研究的关心和重视,我们则感到非常荣幸。

本书的概述、下篇等部分是在我原来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删节而成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侯仁之院士,委员杨吾扬、王恩涌、胡兆量、曹婉如、唐锡仁、杨作民教授,以及评审论文的马正林、朱士光、葛剑雄、于希贤、韩光辉、宋正海、陈瑞平、杨正泰、李宝田、尹均科等教授,在肯定论文学术价值的同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导师杨吾扬教授更是从论文开题、提纲拟定、评审到答辩,每个环节都给予深入细致的精心指导。在此谨向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

值本书出版之际,我还想感谢我的启蒙导师王成组教授。王先生虽已去世,但他以 80 高龄亲自为我授课、逐字批改文章,呕心沥血培育我的情形,终生难忘。李之勤教授为了我能克服困难安心赴京学习,推延了自己的许多研究工作,而在生活和学业上给我以极其重要的帮助和指导。此外,许多师长同好也曾给予我多方面的鼓励与支持。商务印书馆地理室陈江先生、室主任周舜武先生及好友李平先生、叶冰女士等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谨向各位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恳切的谢意。

在与杨正泰先生合作中,无论是全书提纲的拟定、调整,还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评审,都得到过杨正泰先生的支持、理解和帮助。可以说,这本书的每一章都凝聚着我们真诚合作的深情厚谊。

赵 荣

1994 年 12 月 26 日于西安·西北大学

目 录

概述 清代地理学的发展	(1)
一、传统地理学的发展	(1)
二、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6)
三、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8)

上篇 地理著述

第一章 地理总志编纂的成就	(13)
一、《明书》、《明史稿》和《明史》中的地理总志	(13)
(一)《明书·方域志》.....	(13)
(二)《明史稿·地理志》.....	(16)
(三)《明史·地理志》.....	(18)
二、《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21)
(一)顾炎武及其著作的基本特色.....	(21)
(二)《山东肇域记》.....	(27)
三、《读史方舆纪要》	(29)
四、《嘉庆重修一统志》	(35)
(一)编修经过.....	(35)
(二)内容特色.....	(38)
五、《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	(41)
(一)《历代地理沿革表》.....	(41)
(二)《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	(45)
第二章 方志与域外地理志	(49)
一、方志	(49)
(一)清代方志概述.....	(49)
(二)方志举例.....	(54)
二、域外地理志	(62)
(一)《明史·外国传》.....	(62)
(二)《瀛环志略》.....	(67)
(三)《海国图志》.....	(72)
(四)《朔方备乘》.....	(77)

(五)《五洲地理志略》·····	(81)
第三章 河渠水利专书 ·····	(85)
一、水道著作 ·····	(85)
(一)《明史·河渠志》·····	(85)
(二)《今水经》·····	(87)
(三)《水道提纲》·····	(91)
(四)《西域水道记》·····	(93)
二、水利工程专著 ·····	(98)
(一)《治河方略》·····	(98)
(二)《海塘录》·····	(100)
三、水利资料汇编 ·····	(102)
(一)《行水金鉴》·····	(102)
(二)《续行水金鉴》·····	(103)
第四章 地理类编与论著 ·····	(105)
一、类编 ·····	(105)
(一)《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	(105)
(二)《续三通》和《清四通》的《地理篇》·····	(107)
(三)《小方壺齋輿地丛钞》3种 ·····	(111)
二、综合地理著作举例 ·····	(113)
(一)《禹贡锥指》·····	(113)
(二)《水经注疏》·····	(118)
三、清人文集中的地理作品 ·····	(122)
四、《二十五史补编》中的清人地理篇 ·····	(124)
五、《地学杂志》中的地理论述 ·····	(128)
第五章 地图的编制 ·····	(134)
一、《皇輿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輿图》 ·····	(134)
(一)测量成图经过·····	(134)
(二)内容特点·····	(136)
(三)意义·····	(137)
二、《大清会典輿图》 ·····	(138)
(一)编制过程·····	(138)
(二)内容特点·····	(139)
三、《历代輿地图》·····	(142)
四、译编地图 ·····	(143)
(一)《海国图志》地图·····	(143)
(二)《中外輿地全图》·····	(144)
(三)《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	(145)

下篇 地理思想

第六章 地理视野	(147)
一、中国地理认识	(147)
(一) 自然地理要素分布规律	(147)
(二) 边疆地理认识的发展	(156)
二、世界地理认识	(161)
(一) 地球、五带、五大洲	(161)
(二) 世界范围的扩大	(163)
第七章 地理学理论	(172)
一、地理学的体系与理论	(172)
(一) “地理”的含义与地理学体系概念	(172)
(二) 沿革地理学理论	(174)
(三) 方志学理论	(176)
(四) 堪輿学中的地理思想	(179)
(五) 革新地理学思想	(184)
二、人地关系论	(186)
(一) 地理环境决定论	(186)
(二) 人地相关论	(188)
(三) 天命论	(190)
三、其它地理学理论	(190)
(一) 自然地理规律认识	(191)
(二) 水利实践中的地理思想	(194)
第八章 与外国地理思想的交流和比较	(197)
一、交流	(197)
(一) 中西地理思想交流	(197)
(二) 中日地理思想交流	(202)
(三) 对西方地理学的评判	(205)
二、比较	(208)
(一) 关于地理学的性质与内容	(209)
(二) 关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211)
(三) 关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212)
(四) 关于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215)
第九章 清代地理学发展综论	(217)
(一) 清代地理学思想特点	(217)
(二) 清代地理学发展的原因	(221)

概述 清代地理学的发展

17世纪中叶,清兵入关,中国建立了新的封建帝国——清王朝。它先后经历了10朝267年(1644~1911)。在清政府统治这一时期,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社会、政治的变动相关,在清代,文化界、地理学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相融的局面。

一、传统地理学的发展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研究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无论是地志著作的编纂,还是沿革考证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有清一代,先后由个人或官方组织,完成了多部全国性地理志著作。主要有《明史·地理志》;顾炎武(1613~1682)《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肇域志》;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輿纪要》(120卷);陈芳绩(?~1670左右)《历代地理沿革表》(47卷);徐乾学(1631~1694)《舆地备考》、《舆地志余》、《舆地记要》;杨丕复(1780?~?)《历代舆地沿革表》(40卷);段长基(1780?~?)《历代疆域表》(3卷)、《历代沿革表》(3卷);李兆洛(1769~1841)《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20卷)、《清地理韵编》(2卷),以及官修《大清一统志》等。其中尤以《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记》、《读史方輿纪要》、《历代地理沿革表》、《大清一统志》等最为重要。

在地方志方面,清王朝非常重视方志的修纂工作。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为配合《一统志》的编修,康熙帝就曾命各省督抚聘集宿儒名贤,接古续今,纂修各省通志。同时将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河南省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著天下为式,促进了一大批地方志著作的出现。清中叶,政府仍重视地方志的纂修,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就曾针对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①。次年(公元1729年)还颁布了规定各州县志每六十年一修之例^②。当时除了官方组织系统修志外,也有许多学者积极参予私家修志工作。因此,不仅出现了数千种志书,而且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地方志著作。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五。

② 《吉安府志》定祥序:“志例每六十年而一修”。

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 11 000 种^①。而见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 8 000 多种。据我们统计,其中清代约有 5 298 种^②。优秀的有: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朝邑县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安徽通志》、《扬州府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道光《湖广通志》、《雷州府志》、《泾源县志》;雍正时的《畿辅通志》、《贵州通志》,以及缪荃荪(1844~1919)的《顺天府志》等。

特别是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1728~1777)、孙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8)、戴震(1723~1777)、章学诚(1738~1801)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的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方志组成部分的边疆域外地区的地志研究、著述,在清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关于边疆域外的史地研究,在清代前期即已开始。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的有《柳边纪略》(杨宾著)、《宁古塔纪略》(吴振臣著),以及祁韵士的《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要略》,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新疆识略》以及《明史·外国传》等边疆域外地理著作。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限于对东北、蒙古、西北各地的风土见闻等记载,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研究。

自鸦片战争以后,关于边疆域外地理研究的情况大有改变,一方面研究人员增多,二是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方向,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据对清代有关地理著作文献的分析统计,仅研究西北地区边疆史地的著作,约有 200 多人、300 多种,其中 80% 的研究著作是在清道光以后至清末这段时间出现的^③。出现了黄沛翘、曹廷杰、何秋涛、魏源、徐继畲等著名边疆域外地理研究者。著作有沈垚(1798~1840)的《新疆私议》、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龚自珍(1792~1841)的《乌梁海表》、《蒙古图志表》、《西域置行省议》、朱一新(1846~1899)的《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曹廷杰(1850~1926)的《东三省舆地图说》、黄沛翘的《西藏图考》、屠寄(1856~?)的《黑龙江舆地图及图说》,以及魏源(1794~1856)的《海国图志》、徐继畲(1795~1872)的《瀛环志略》、同康庐的《中外地舆图说集成》(光绪二十年,即公元 1894 年刊印)、萧应椿的《五洲述略》(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 1902 年刊印)、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宣统二年,即公元 1910 年刊印)等。

这一时期,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士大夫倍感痛心疾首,所以,许多人是抱着“以求抚驭之宜”“徐筹制夷之策”的目的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他们或旁搜博采,援

①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三联书店,1983 年版。

②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统计为 5 518 种。第 342 页,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③ 王记录:“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述论”,《兰州学刊》,1989 年第 6 期。

古证今;或亲历边疆实际考察。因此,这一阶段除了一般的考证、见闻记述研究外,研究工作往往是与时政紧密相关。如黄沛翘在《西藏图考》中就说道:“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兼并廓尔喀、哲孟雄诸部,铁路已开至独吉岭,其言重在通商,而唐古特部众又复迭次阻挠,难保不发生变故,且边界汉番杂处,万一乘机窃发,处处堪虞,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曹廷杰在他所著《东北边防辑要》一书中,更是重点介绍山川险要以利防守,并在书中指出何秋涛之所以著《朔方备乘》,是与“俄人乘隙窥我东北”有直接关系。何秋涛自己也在该书的叙言中说,他写《朔方备乘》是为了“备国家缓急之用”的。

此外,在清代的传统地理学发展中,还出现了一些汇集历代地理著述的类编型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方輿类汇编、《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以及清末王锡祺(1855~1913)的《小方壶斋輿地丛钞》。

中国历代重视河渠水利事业,因此,有不少专述河渠水利,以及河流状况的著作存世。清代较之过去各代更有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于当时全国河流水系状况和历代水利资料汇集的著作。主要有:黄宗羲(1610~1695)《今水经》(1卷);姜宸英(1628~1690)《江防总论》(1卷)、《海防总论》(1卷);傅泽洪(1640?~?)等撰的《行水金鉴》(175卷);黎世序等的《续行水金鉴》(156卷);齐召南(1703~1768)《水道提纲》(28卷);王太岳(1722~1785)《泾渠志》;赵一清(1722?~?)《直隶河渠志》(132卷);戴震《直隸河渠书》(110卷);程瑶田(1725~1814)《水地小记》(1卷);李元(?~1816)《蜀水经》(16卷);陈揆(1780~1825)《六朝水道疏》;徐松《西域水道记》(5卷);陈沣(1810~1882)《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7卷)等。其中以《行水金鉴》、《水道提纲》、《西域水道记》等,尤为重要。

成书时间很早的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在长时间中,主要靠相互传抄、翻刻流传,因此,到清代时,各种古代地理著作的版本就比较多。它们相互之间都有缺漏、差异,甚至造成意思上的矛盾。加之中国上古、中古语言、文字变化较大,后人对古人著作的理解因时代不同,文字的解释上也各有差异;思想上的理解更是各有见解。这些都为后代阅读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由乾隆时期兴起的“考据”学派,其最主要的工作,首先便是对古代著作进行文字、版本上的整理、校勘和意义(内容)上的注释,在地理学方面,用力最勤、成绩最显著者,主要是对《禹贡》、《水经注》,以及正史《地理志》的校勘、注释。

关于《禹贡》的校勘,主要有胡渭、徐文靖、程瑶田、丁晏等。清初胡渭(1633~1714)曾著有《禹贡锥指》20卷,地图47幅。搜集历代方志輿地著作史料,对《禹贡》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考释注解。还对所谓“禹河”(传为大禹治水后的黄河下游河道)在历史上的迁徙,以及汉、唐、宋、元、明代黄河河道进行了精密考证。此后,徐文靖(1667~1757)在胡渭研究的基础上,又旁引、参校其他版本著作,写成《禹贡会笺》12卷,总汇各种解释校注成果。程瑶田则著《禹贡三江考》,专门考释长江。丁晏(1794~1875)所著《禹贡锥指正误》,主要是对胡渭校注中的一些错误进行辨析、补正。

关于《山海经》的校勘,主要有毕沅(1730~1797)的《山海经新校正》(18卷),郝懿行(1757~1825)的《山海经笺疏》(18卷)。毕沅主要对《山海经》的篇目、文字、山川等进行了考证,尤其

是在山川方面,加强了地理内容的考释。郝懿行较毕沅晚,他的著作除了文字等校释外,对山川方位等论证,多与毕沅相同。

关于正史《地理志》的校释,当时用功的人很多。主要有:钱坫(1744~1806)撰、徐松集释的《新斟注汉书地理志集释》(6卷);汪远孙(1794~1836)的《汉书地理志补校》(2卷);全祖望(1705~1755)的《汉书地理志稽疑》;毕沅的《晋书地理志新校正》(5卷);洪颐煊(1765~1833)的《汉志水道疏证》(4卷);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103卷)等。他们订补了《地理志》中的不少错讹之处。

关于《水经注》的校勘注释,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自问世以来,即被后人广为刊印、传抄、引用。到宋代,版本间已有了较大差异,所以金代开始,即有人进行《水经注》的版本、文字整理校订,但直到明代朱谋玮的《水经注笺》,都不十分精慎。到了清代,对《水经注》的校勘研究,一下成了一门用功最多的学问,几乎清代第一流的学者,十有八九都校注过《水经注》。其中清初有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胡渭、黄仪、刘献廷;清中叶有齐召南、全祖望、戴震、赵一清、孙星衍、段玉裁;清晚期有陈沚、王先谦、杨守敬、熊会贞、丁谦等。其中校注《水经注》最有名的是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杨守敬。而尤以清中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文字、版本整理为重要。全祖望著有《全氏七校水经注》,赵一清有《水经注释》,戴震有《水经注》。他们通过文字、版本的比较校勘,校理清楚了《水经注》在传抄过程中的《经文》、《注文》相互混杂、篇目混乱的现象,基本理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水经注》版本,为以后的《水经注》研究、使用,奠定了基础。

清代学者除了对几种主要地理著作的校勘外,还对其它相关地理著作进行了校勘、注释、整理,特别是进行了许多地理考证工作,如:张庚(1681~1756)的《通鉴纲目释地纠谬》(6卷)、《通鉴纲目释地补注》(6卷);江永(1681~1722)的《春秋地理考实》(4卷);檀萃(1740?~?)的《穆天子传注》(6卷);王绍兰的《管子地员篇注》(4卷);马宗槌(?~1802)的《战国策地理考》;陈懋令(1759~?)的《六朝地理考》;陈揆的《六朝水道疏》;沈钦韩(1775~1831)的《释地理》(8卷);管同(1780~1831)的《战国地理考》;郑瓚(?~1825?)的《春秋地理今释》(20卷);徐松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考》(2卷);程恩泽(1785~1837)的《国释地名考》(20卷);王鑒(1786~1843)的《四书地理考》(14卷);丁晏的《禹贡集释》(3卷);洪麟孙(1804~1859)的《补梁疆域志》(4卷);姚燮(1805~1864)的《胡氏禹贡锥指勘补》(12卷);陈沚的《水经注提纲》(40卷);杜文灿(?~1887)的《禹贡川泽考》(4卷)、《毛诗释地》(6卷)、《春秋列国疆域考》(1卷)、《群经舆地表》(1卷);何秋涛的《蒙古游牧记补注》(4卷);李文田(1834~1895)的《元史地名考》、《耶律楚材西游录注》;赵元益(1840~1902)的《战国策略地》(2卷);缪荃孙的《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遗文》(3卷)等。特别是清末杨守敬、丁谦、王锡祺的工作最为重要。

杨守敬除有关历史地图工作外,在文字考证方面,以《水经注疏》40卷和《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最为重要。《水经注疏》博采《经》、《传》、《雅》、《记》,相互参证,校正疏理酈注疑滞,利用地志、图经反复校勘,更正酈注本身错误,同时对酈注所征引史实,皆注明出处。其用功之深,考

证之详慎,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如潘存题词说:“楚北杨君惺吾(守敬)所撰《水经注释》,神光所照。直与邴亭共语,足使谢山却步、赵戴变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数,霾蕴岁久,焕若神明。旷世绝学,独有千古,大雅宏达,还我河汉”^①。《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是杨守敬历时30年,“五易其稿”,悉心研究的成果,该书旁征博引,广为诠释,不仅在《隋书·地理考》地名下注以今地,补叙其沿革及治所迁移,而且书其命名由来和重大历史事件,大大丰富扩充了《隋书·地理志》的内容。同时订正了书中记述,以及相关资料的许多错讹之处。杨守敬的工作弥补了《隋书·地理志》的不足,成为有关《隋书·地理志》研究的划时代之作,至今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地理志》,“采用《杨考》者亦较多。”^②

丁谦(1843~1919)是清末以考证著称的地理学家,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地理考证和古代史籍中的外国传考证两方面。其著述后由浙江省图书馆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印行,分为两集,称为《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或称《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其第一集收入著作17种35卷,包括:《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汉书西南夷朝鲜传地理考证》等。第二集收入的著作为:《穆天子传地理考证》、《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卷;《宋云西域求经记地理考证》12种33卷。^③ 丁谦的考证严谨、广泛、系统,他的著作被誉为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天下之奇作”,^④ 是清末传统地理学继续发展的又一典型标志。

作为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图,在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除了各种地图大量出现外,最突出的发展变化是: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和经纬绘图法在传统地图中的出现。

关于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在中国出现很早。晋裴秀(224~271)就曾绘制过历史地理图集性质的《禹贡地域图》18篇。^⑤ 清代的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不仅在种类上众多,而且在质量、范围、系统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早在清初,胡渭《禹贡锥指》中就附有18幅历史地图。清道光时,李兆洛主持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图》,以《皇朝(清)舆地图》为底本,将上自禹贡、夏、商、周、春秋、战国,以至元明各代地名注于其上,制成22幅地图,以红色印制底图(清代)、墨色标记古代地名的传统“朱墨套印”法制版。同时,又将《皇舆表》、《一统志表》中的各地历史沿革注在图上,以便相互对照,成为清代一部重要的历史地图集。此后,杨守敬所绘制的《历代舆地图》(又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更是将清代,以及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沿革地理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关于西方经纬度制图法在中国传统地图中的出现,除了作为独立的西方制图法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等存在于清代的大量地图中之外,重要的是,在清后期的许多中国人绘制的传统地图中,出现了不少运用西方制图法的痕迹。如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湖北出版的《大清一统舆图》(又称《皇朝中外一统舆图》,邹世诒、晏圭斋等编绘),就是将西方的经纬

① 《水经注疏要删·潘存序》。

② 《隋书·地理志》注释。

③ 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刊本目录。

④ 《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序言》。

⑤ 《晋书·裴秀传》。

度和传统的计里画方法混合使用。清末,为编制《大清会典舆图》,在其所规定的制图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以传统画法为基础和对西方制图法的采用。如:既规定使用计里画方法,又要求省图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圆锥投影”法。^①而在已编成的许多省级地图集中,都体现了这种中西制图法混用现象。如《甘肃全省舆图》、《安徽舆地图》、《陕西省舆地图》等,不仅有经纬度,还有图例方面的科学化革新,尽管这些图上的经纬度、投影法等,都极为简单、不准确,但却是中国传统地图法向近代科学制图法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明中叶以后,西方基督教耶稣会为了向外发展势力,先后多次派遣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教布道。明万历时即有不少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西方新知识,尤其是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aeus Ricci或Matteo Ricci,1583~1610年在华),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o Aleni,1610~1649年在华)、日尔曼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n Schall Von Bell,1622~1666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1606~1620年在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99~1618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97~1654年在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59~1688年在华)等^②,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宣传了大量西方新知识,其中地理知识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宣传主要以一些世界地图、地理著作为载体。

据统计^③,仅利玛窦在华制作的各種世界地图就有10多幅,其图名、绘图时间、刊刻等情况见表1。地理著作方面有:龙华民的《地震解》;利玛窦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艾儒略的《坤輿图说》、《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輿图说》(《坤輿全图》)、《坤輿外纪》等。

通过这些地图、著作的编制、流传,主要向中国社会介绍了地球的球形体、世界地理形势、风土人情、经纬度制图、投影法等西方地理、地图知识。自明末清初,这些地图、著作被反复刻印、抄录,并以它丰富的地理内容和科学方法,给当时中国的传统地理学以及地理认识以很大冲击,甚至出现了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特别在绘制地图方法等方面,西方经纬度测量、投影法等,更是给中国传统“计里画方”制图学以根本否定,致使清初聘用西方传教士,采用西法,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经纬度大测量和全国新地图的编制活动。

清初康熙帝对地图测绘非常重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他给《大清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的上谕中曾说道:“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特命卿等为总裁

① 高儒:“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测绘学报》,1962年第4期。

②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

③ 洪煊莲:《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5卷3~4期,1936年。〔日〕鮎沢信太郎:《地理学史的研究》,第38~108页,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版。中科院科学史所地学组:《中国古代地理学》,第331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①此后,他通过对用西方经纬度法测制的京师附近地图(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1707年)的亲自校勘,看到新法测绘的地图确比旧图要精确。因此,在进行了必要准备工作后,遂下令采用西法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工作。

表1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

图 名	绘图时间	刊刻者	绘图地点	备 注
山海輿地全图	1584	王泮刻版	肇庆	
(世界图志?)	1559		南昌	绘赠王多煊
山海輿地图	1595~1598	赵可怀刻石	苏州	翻王泮本
世界图记?	1596		南昌	王佐编制
世界地图?	1596		南昌	绘得一、二本
山海輿地全图	1600	吴中明刻版	南京	增订王泮本
輿地全图	1601	冯应京刻版	北京?	二小圈图等
坤輿万国全图	1602	李之藻刻版	北京	增订吴中明本
坤輿万国全图	1602	刻工某刻版	北京	复刻李之藻本
山海輿地全图	1604	郭子章刻版	贵州	缩刻吴中明本
世界地图?	1606	李应试刻版	北京	增订李之藻本
(坤輿万国全图)	1608		北京	诸太監摹绘李之藻本多份

自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到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康熙帝聘请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 1663~1738)、杜德美(Petrus Jeartoux 1668~1720)等人,率领中国测绘人员进行全国大地测量工作。先后测绘了全国641个点(未含西藏)的经纬度。在此基础上,采用西方地图投影法编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輿全览图》。到清乾隆时,清廷平定了新疆等地后,曾两次(乾隆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派人前往新疆测绘了哈密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90个经纬点,又调整了内地省份的个别经纬点。然后以《皇輿全览图》为基础,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补绘成一幅《乾隆内府輿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图幅涉及范围比《皇輿全览图》扩大1倍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地图,也成为20世纪初以前中国各种先进地图的蓝本。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扩张,许多西方地理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同时,一些地理考察家在19世纪中叶以后,也以各种目的来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将中国作为亚洲大陆腹地探险的组成部分,这也扩大了国外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影响。此外,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为了了解世界,也积极编写了一批世界地理著作,加速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①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六。

据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备》统计,自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到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近 60 年间,共有 468 种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属于地质地理学的就有 58 部,包括林则徐主持翻译的《俄罗斯总记》、英国衣丁保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英国艾约瑟的《冰洋事迹述略》、英国莱伊尔的《地学浅释》、吴宗廉等译的《澳大利亚新志》、日本野口保兴的《中华大地志》、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志》、辻武雄《五大洲志》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地理、地质学家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地理、地质和资源考察,足迹几遍中国内地,尤其是边疆各地。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 Pumpelly),他 1862 年来华,曾考察了华北和长江上游一带地区。1904 年他再次来华,与美地理学家戴维斯(W. H. Davis)和亨丁顿(E. Huntington)考察了天山和塔里木盆地。1903 年,美国地理学家威里士(B. Willis)曾率队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陕西、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考察,归国后著有《中国的研究》一书。俄国地理学家普日瓦爾斯基(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在 1870~1884 年期间,先后 4 次来华考察,足迹遍及内蒙古、新疆、青海、藏北等广大西部地区,著有《蒙古和唐古特地区:在东部亚洲高原的三年旅行》、《从伊宁经天山到罗布泊》等著作。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1892~1926 年期间,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到过青海湖及河源地区,著有《蒙古与喀木:1899~1901 年科兹洛夫的探险报告》等著作。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曾在 1860、1868 年来华,考察了中国东部各省,以及西北内陆地区,著有《中国》一书,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考察成果。此外,法国人戴普拉(J. A. Deprat)等对中国西南地区、英国人麦克唐纳(D. MacDonald)等对西藏地区、日本人对中国各地、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对中国西部地区,都进行过重要的地理考察和探险活动。他们的考察,都采用西方近代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地理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记述,并著有多种研究报告。他们的科学成果,一方面向国外社会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状况,同时,往往又成为中国近代地理研究的基础,扩大和促进了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入。如他们关于北方地文期,关于黄土成因和气候变迁,以及罗布泊地理等问题的探讨,都成为后来中国地理研究的热点,促进中国学者对科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视,加速了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

三、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侵略,在中国先后出现了“洋务派”、“维新派”,先后提出了要放眼世界,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开办新式学校,改良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学习“西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学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在清末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是翻译、编著了许多外国近代地理著作,介绍外国的地理环境、地理方法。其次,随着 19 世纪末新式学校的陆续开办,学校地理教育也受到重视。特别 1909 年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兴起。